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八)

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八)

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文集。全书共收录文章三十七篇，其中纪念类文章十九篇，学术研究类文章十八篇。纪念类文章回顾了邹衡先生生前事迹和学术活动，生动感人；学术研究类文章则涉及以夏商周时期考古为主的考古学、历史学及古文字学等诸多研究领域，讨论深入。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研究. 8, 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ISBN 978-7-03-032873-1

I. ①考… II. ①北… ②北…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313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李 茜 / 责任校对: 刘小梅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6 1/4

字数: 605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纪念篇

邹衡先生与河南夏商考古	许顺湛 (3)
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	张忠培 (6)
凿空的智慧 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刘士莪 (10)
求实创新 探索前进——学习邹衡先生的治学精神	郑杰祥 (21)
孜孜矻矻是本色 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张文彬 (24)
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徐自强 (32)
邹衡先生最后的学术活动	陈 旭 (37)
怀念邹衡先生	王宇信 (40)
严师诤友——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一周年	尹盛平 (41)
邹衡先生仙逝三周年的思念	郑 光 (45)
忆邹衡	林小安 (49)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夏麦陵 (56)
难忘在邹衡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许 伟 (65)
先生睿智之光指引我的学术路	宋 建 (75)
忆邹衡师二、三事	李水城 (80)
重温邹衡先生《中国文明的诞生》之感	宋豫秦 (85)
跟随邹衡先生在新疆考察的往事与回忆	水 涛 (89)
邹衡先生与“郑亳说”创建历程	李维明 (96)
附：《考古学家邹衡》订补	(105)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张天恩 (107)

学术篇

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	严文明 (117)
禹都的历史纠葛——为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而作	陈 旭 (143)
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	董 琦 (152)
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陶炊器——鼎·鬲·甗·甗	饭岛武次 (159)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	王立新 胡保华 (179)
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的若干问题	刘 绪 (194)
郑州商城瓮棺葬死者身份探析	郑杰祥 (210)
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分析	李维明 (214)
偃师商城名“汤”说补考	张立东 (225)

夹山商周时期土墩遗存的发掘及若干问题	杨楠 (235)
夔马盘铭文与晋侯墓地排序	李伯谦 (244)
晋侯邦父组墓的初步分析	孙华 (249)
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	王占奎 (267)
周初“宅兹中国”考	武家璧 (279)
宗周、“周”邑、“周庙”与岐周辨析	程平山 (285)
周代棺饰与铜簋浅识	张天恩 (293)
早期晋都丛考	孙庆伟 (305)
山东菏泽安邱堽堆遗址 1984 年发掘报告	
.....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菏泽地区博物馆 菏泽市文化馆	(317)
后记	(406)

图 版 目 录

- 图版一 安邱垆堆遗址外景及 F5
- 图版二 安邱垆堆遗址遗迹
- 图版三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龙山时期陶罐
- 图版四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龙山时期器物
- 图版五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龙山时期陶器
- 图版六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岳石时期陶器
- 图版七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商时期陶鬲
- 图版八 安邱垆堆遗址出土商时期遗物

纪 念 篇

邹衡先生与河南夏商考古

许顺湛*

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衡先生，于2005年12月27日驾鹤西去，我得到这一噩耗十分震惊。2005年10月，他还前来参加在郑州召开的“纪念郑州商城发现50周年”会议，我因有病未能与之相见，据说他在会议上还作了重要的讲话。中国考古界失去了一位领军人物，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思前想后真是令人伤心。

我与邹衡先生相识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攻读副博士学位，来到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商城发掘工地实习。他生活不讲条件，能吃苦，学习勤奋。这个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不久，于1956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了《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我读后感到十分惊讶。他把郑州的殷商文化和安阳小屯的殷商文化对比研究，有理有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文化发展序列，即：郑州早期——→郑州中期——→小屯早期——^{郑州晚期}_{小屯中期}——→小屯晚期。这个序列最重要的一点，即以论文形式公开提出郑州商文化遗址早于安阳殷墟。他在这样短的时间，能提出如此精辟的结论，是一个天才，那时我从心底里敬佩这个年轻人。

1955年郑州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商城，当时学术界认为是“仲丁迁隰”的隰都。特别是安金槐先生于1961年发表了郑州商城为隰都的论文，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了定论，很长时间学术界一直是风平浪静。与此同时，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大面积的二里头遗址，内涵十分丰富，不少学者认为是汤都西亳的遗址。汤都西亳，仲丁迁隰，盘庚迁殷，商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一清二楚。谁也没有料到邹衡先生默默地在进行着一项“逆潮流”的研究工作。在1977年登封会议上他约6小时的两次发言，公开阐述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是夏文化，不是汤都西亳，并透露出汤都郑亳的观点，这太出乎与会先生们的意料。虽然大家极力反对这一新观点，但因为缺乏思想准备，一时也提不出有力的反驳意见。登封会议结束后，1978年邹衡发表了《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的论文，1979年发表了《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不平静了，郑亳说、西亳说、隰都说针锋相对，连篇累牍的论文屡见于报刊。我当时的基本观点是郑州商城为隰都，偃师二里头遗址为西亳，邹衡的新观点直接冲击了我的认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史前文化，对夏

* 许顺湛，河南博物院，450002。

商文化没有深入探讨,当我看了邹衡的文章后,心服口服,于1979年在《河南文博通讯》发表《夏文化探索》一文中,公开自我否定而支持邹衡的观点。当时以安金槐先生为首在郑州发掘的商城,学术界多称为隰都;以赵芝荃先生为首在偃师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多称为西亳。当郑州隰都说、偃师西亳说呼声满天下之际,邹衡先生突然提出偃师二里头不是西亳而是夏都,认为郑州商城不是隰都而是汤始建的亳都。隰都说、西亳说在学术界占绝对的优势,郑亳说和二里头夏都说当时属于少数派,两个学派争论相当激烈。1986年初,我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住在郑州市黄河饭店,邹衡托人捎口信,希望我也能参加论战。我感到有困难,因为我对夏商这一段的考古材料不很熟悉,我答应试试看。在开会期间利用晚上的空隙,写成了《偃师西亳说的困境》一文,这篇文章我是客观地评述,摆事实讲道理,认为偃师西亳说确实是处于困境。评述的结果肯定了偃师二里头即夏都说,否定了二里头即汤都西亳说。但是,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为偃师西亳说找到了一条出路,偃师西亳说的牌子并没有倒,只是把二里头换成尸乡沟而已。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我担心邹衡先生无法再争论,谁知道他又提出尸乡沟商城是桐宫来对付西亳说。所以,我在《困境》一文中说:“偃师商城的上空飘扬着西亳说和桐宫说两面大旗,郑州商城的上空飘扬着郑亳说和隰都说两面大旗,旗鼓相当,郑亳说和西亳说的争论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特殊阶段。”郑亳与西亳说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告诉我:“你不该写《困境》一文,安金槐、赵芝荃、邹衡都是你的好朋友,何必!”这是对我的误解。我完全是从探索真理出发,没有感情成分,例如我在《困境》一文最后有一段话:“不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尽管在认识上有不同看法,但是大家都承认它是考古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现,没有这些发现,连争论的基础都没有了,更谈不上谁是谁非。因此应该为这些重要的发现叫好。同时,应该为长期在那里从事发掘工作的同志唱赞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的老朋友安金槐同志和赵芝荃同志,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为夏商考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论是二里头夏都说、西亳说或尸乡沟西亳说、桐宫说还是郑州商城郑亳说、隰都说,都得感谢他们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困境》一文发表后,接到邹衡先生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高兴地说:“文章原则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安金槐先生见到我开口便说:“老许,打了我两棍又揉揉搓搓,你真捣蛋!”说完哈哈大笑,反映了他民主的学者风度。

1993年在郑州召开“郑州商城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写了一篇《隰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对峙的双方所发表的论文都是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单看隰都说的文章有理有据;再看郑亳说的文章也是头头是道,合情合理。我是一个凑热闹的学者,读了对立双方的论文后,发现隰都说的理论缺陷较多,例如:商代的纪年上下限,隰都说认为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郑州商城测年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公元前1620年,一个是公元前1595年,这分明属商代早期,而隰都说硬要讲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隰都。隰都说认定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繁荣期与衰败期基本上是同时的,却把偃师商城定为西亳,把郑州商城定为隰都。隰都只有20多年历史,与郑州商城的始建到衰败年代绝对不符合。郑亳说的理论根基比较科学,论证的方法比较缜密。汤都亳

文献记载曾有四说，邹衡先生对杜亳说、南亳说、北亳说、西亳说逐一进行了研究论证，认为这四亳之说均不能成立。不仅如此，邹衡先生还带着他的学生有目的地进行调查和发掘，在内黄、濮阳等地考察后，写了《内黄商都考略》一文，彻底否定了汤都“黄亳说”。在豫东作了普遍调查和发掘，彻底否定了南亳说。在陕西通过调查发掘，未发现杜亳的任何线索。在晋南垣曲进行调查后，写了《汤都垣亳考辨》，彻底否定了垣亳说。在山东进行了考察，彻底否定了北亳说。在安徽进行调查和发掘后，认为所谓安徽亳都之说完全没可能。邹衡对诸亳采用逐个排除法，扫清了周围的障碍，最后肯定了郑亳。在肯定郑亳说的过程中，他一直关注早商文化的来源，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先商文化北来说，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关于郑亳说，在多数学者中已取得了共识，遗留问题是偃师尸乡沟商城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尸乡沟商城是军事重镇；有的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主都，尸乡沟商城是辅都；或认为郑州商城是首都，尸乡沟商城是陪都；邹衡先生提出尸乡沟商城是桐宫。他在《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中说：“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很多先生的误会，以为我只说是一座桐宫，未及其他。也许是读我的文章还不够仔细吧。既然是早商的桐宫，当然包括了早商的诸王（也有成汤）所居在内。离宫一词，我是照郑玄的说法，何况在晚商仍有离宫存在。所谓离宫自然就是别都或陪都之意了。难道单指一座宫殿？”这段话非常清楚，邹衡虽然提出桐宫说，但也承认别都或陪都说。主都、首都在郑州，辅都、陪都在偃师，偃师在郑州之西，称为西亳是合情理的。鉴于上述情况，我在偃师国际商文化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两京制——郑亳与西亳”的观点。因为我肯定了郑亳又没有反对桐宫，所以会下邹衡先生对我说：“发言很好。”从总体来看，邹衡先生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先商文化的走向与分布、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等的认识，都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为夏商周考古树立了基本可靠的年代标尺，他对考古学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邹衡先生对晋国、燕国以及夏商等大型都邑遗址的保护，都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河南召开的许多大型会议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如论证郑州商城的保护规划，他有请必到。特别是郑州被列入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邹衡先生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如果不是郑亳说的确认，郑州进入“八大古都”的行列是绝对不可能的。在1993年“郑州商城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上，他积极参与把郑州列入“八大古都”的倡议；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郑州商都3600年座谈会”，他又参与了把郑州列入“八大古都”的倡议。为了宣传郑州，郑州市编辑出版《古都郑州》一书，我给他打电话，他很爽快地答应担任该书的顾问。2004年在郑州召开的“商都3600年”学术会议，邹衡先生又到会发言，为郑州列入“八大古都”摇旗呐喊。所以说，郑州被列入“八大古都”之一，邹衡先生的贡献不可忽视。

邹衡先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著述等身，学术成就和追求科学真理的治学精神，为学人所敬仰。邹衡先生去世了，他的名字和精神将流芳千古。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还是要向邹衡学习

——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

张忠培*

邹衡是我的乡长。他开始攻读考古研究生的时候，我刚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学习，因此，邹衡也是我的学长。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这五年中，邹衡的音容常常浮现于我的心中，仍是那样的清晰，从未因我们的分手出现过丝毫的锈蚀，且随着我的追忆而愈益明亮。我们之间有着半个世纪的情谊，交往频繁，回忆起来经常想到的是印象最深的这几次。

邹衡攻读研究生的前两年，历史系的研究生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攻读中国近代史的李时岳。李时岳后来和我在吉林大学共事。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时，我是历史系副主任。我们是能谈心里话的好朋友。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自20世纪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起，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在他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流。我们一些本科生，自然想见见这两位研究生。我读大学的前三年，邹衡基本守在郑州的考古工地，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直到大学第四年即1955年初秋，我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地实习的时候，邹衡研究生刚刚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上任路过西安特意下火车到半坡遗址工地参观，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邹衡仔细地看了工地发掘情况后，便和我们一些同学聊了起来。邹衡桃形的脸上，嵌着中等大小的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起话来，面肌舞动，嘴角挂着吐沫，口沫飞溅，他著长及大腿的深色粗呢的民国时期式样的学生装，衣的内领有一层油腻，黑色的脸上盖着薄薄的黄尘，活脱出是刚从“灰坑”或墓葬中爬出来的考古匠人，是一心扑在田野中的朴实的考古人，这是我同邹衡头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或者说是我对他的感觉。

1958年秋，我参与主持黄河水库的华县考古队工作，负责泉护村南台地遗址的发掘，考古教研室的资料员、邹衡的前妻郭淑华同志在这工地实习。她期中回京休假返回工地后，立即找到了我，说她犯了错误，同时向我交出了一件异形器。我感到莫名其妙，便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在发掘时，发现了这件异形器，感到好奇，藏了起来，带回家中给邹衡看。没有想到，邹衡看了很生气，质问她怎么能把考古发现的物品私自藏了起来，带回家中哩！这犯了规矩。叫她将原物完好地带回工地，交代清楚，听从处置。我听郭淑华说明后，立即问她这异形器出自什么单位，又在现场经反复校正出

*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100009。

土单位和要她写了说明附入相关记录后，我据工地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她说，你犯的错误性质严重，要做书面思想检讨。郭淑华态度诚恳，虚心接受批评，写了较为深入的检讨。通过此事，我深刻感到邹衡对考古发掘非常认真，对发掘人员应遵循的纪律持严肃的态度，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属，也毫不含糊。

1959年12月24日，我结束了泉护村考古工地工作。返京途中在洛阳下车，参观王湾等遗址发掘资料。当时王湾工地发掘已经结束，邹衡正带领学生整理发掘资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发掘成果，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哪个单位复原了多少件陶器，在这里，我亲眼目睹邹衡夜以继日地拼对陶片，复原陶器，每当将一些陶片拼对能复原一件陶器时，他便手舞足蹈，显露出来的是人生童稚时代才能出现的那种乐趣。看到了这些，我深深地感到了华县工作和邹衡负责的王湾工作之间的差距。面对邹衡，我为此感到羞愧！决心向他学习。邹衡对拼对陶片复原陶器这种热情的追求和考古工作作风便成为我此后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榜样。

1960年，我参加了由邹衡主持的《中国考古学·商周——青铜时代》编写工作，负责撰写《西周前期》和《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文化》章节。这《商周——青铜时代》由邹衡、祝广琪和我分头编写，邹衡通纂定稿，当我接到邹衡改过的我负责编写的那部分章节后，翻开看时，见到除了我写的文字外，就是邹衡用毛笔删去我写的文字的粗黑横杠和改写的文字。这横杠和文字密密麻麻，我写的文字几乎被淹没在邹衡所划横杠和改写的文字中。见了这密密麻麻的横杠与文字，很不是滋味，气上心头，我写的这部分稿子需要这样大的改动吗！但冷静下来认真看下去，就越来越感到邹衡改得很对，经他这一改动，我写的文字简洁了，逻辑性更强了，论证更清晰了。因此，我更服邹衡了。此后的一两年，邹衡讲授商周考古时，还邀我给学生讲授由我写著的这些章节，我由此感到邹衡对我写的这部分章节，还算基本肯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情面地改写了我写的那部分章节，这说明邹衡对讲义的写著，是持从严要求、对事不对人的严格认真负责的态度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见到有些著作竟然抄袭我参与《商周——青铜时代》写著章节的一些内容，其中尤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为甚，气愤之时，给《人民日报》写了一信，揭示此事，要求《人民日报》予以发表，或转给有关方面给我一个说法。那年我到北大修改《元君庙》和《泉护村》，将此事告诉邹衡。邹衡顿时气愤起来，说也抄袭了他写的那部分，实在太恶劣，说他将此事反映给系主任翦伯赞，翦老已将此事向郭老说了。我俩认为这事既与郭老无关，也当与实际负责主编尹达无关，是具体负责写著的人干的。我俩反抄袭的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成了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绝不是全无消息，所谓无消息，仅是剥夺了反对学术抄疾的发言权，此其一；其二是到了史无前例时期，翦老竟被编写《中国史稿》那个单位的几个笔杆子打成了“西霸天”和“保皇党”，与此事也当有点关系。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批翦老的文章吓了一跳。担心将清查到自己头上。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内人，当“文革”进入高潮的1967年，我的内人被吓得将翦老坐在藤椅上和我站在他身后的这张合照避着我烧掉了。

“文革”晚期，我同邹衡谈及此事，他说他也有同感。“史无前例”是搞“打、砸、抢”，学术上的“打、砸、抢”分子自然活跃起来。邹衡一贯坚持学术道德，对学术抄袭疾恶如仇，坚持反对学术“打、砸、抢”，当以此为始。

《商周考古》出版后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山西见到了邹衡，聊天时，他忽然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出来的。接着又说，他带领学生多次实习，负责过一些工地发掘，就是不让他写报告。这次山西的发掘，总得让他写报告了吧！埋怨不让他写考古报告这事，我曾听他讲过多次，埋怨《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则是第一次听到，听来不顺耳，感到很突然。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台，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我想这就是邹衡所以不惜发出怨言而力争编写考古报告的未曾言明的理由。邹衡历经9年发掘，7年室内整理、编写而于2000年出版的巨大的考古报告《天马一曲村》，则为我们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应怎样对待田野考古和怎样编写考古报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楷模。邹衡为什么那样讲自己编写的《商周考古》？将邹衡1980年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和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作番比较，或可窥知其中的一些奥秘，看到邹衡未曾讲明的心意。是以郭沫若的说法这一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主流理论为纲，以填格子的方式将考古资料塞进那预设的格子之中，还是自主的务实求真地探讨学术问题，是这两书的基本区别。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务实求真”也不是指不去研究夏商周社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这类重要问题，但是否去研究这类问题，完全是应被尊重的作者的自主权利，当作者对这类问题未作研究，或有自己的见解的情况下非情愿地以他人的认识作为格子填塞考古资料的做法，无疑则是非自主的、非务实求真的写作。我想这当是邹衡所以说《商周考古》是工宣队逼迫他写的本意吧。邹衡说《商周考古》是被工宣队逼迫写的，仅涉及表层现象，其实这是史无前例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现了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我想邹衡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只是他不想说白而已。邹衡对《商周考古》的这一表态，是曾被剥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呼唤自由的务实求真的学术研究的呐喊！

时间的车轮飞转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我因晋侯墓被盗事件去了山西，和邹衡又有过两、三次接触，亲眼见到了邹衡那直面千夫指对盗墓贼和为盗墓贼、更为自己失职行为辩护的那帮官僚的愤怒，此时的邹衡已置自身安全于度外，成了反盗墓保护文物的勇士。

邹衡2005年11月住进了医院。我得到这令人不快的消息后，曾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他的身边学生，要求前往医院探视邹衡，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令我震惊和深切悲痛的日子终于来临，这是2005年12月27日20时21分，我忽然接到邹衡的学生李维明的电话，告知我邹衡病危的消息。我问明了地址，立即叫了车，直奔北大三院邹衡所住

的病房，在走廊中见到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几位学生，我看了手表，时钟正指向 20 时 3 刻，他们让我赶快到病房去！我被他夫人领进了病房，只见他留着平头，脸色灰黑透亮，安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言语。我凝视着邹衡，感觉回到了 1955 年，他是考古人，刚从田野中归来，略事休息，又要出发，奔到田野中去。真实的时间却已经是 2005 年了，这位终生未曾变色的考古人，再也不能回到田野中去作新的探索了，只能终生告别田野了。此时此刻，给这位考古老兵送行的，除了他的亲属及几位学生外，竟然没有他毕生奉献的学校负责人，清凉、伶仃这类词奔上脑中。除此之外，我想到的还是：邹衡自 1952 年攻读考古研究生，至今已近 54 年。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跑田野，钻地层与遗迹单位，摩挲陶片，坐书房，审度爬梳资料，上讲堂，传道授业，从 1958 年以来大学毕业凡从事商周考古专业的中外学者，多出自他的门下，得到过他的教益，考古科研与教学成了他的第一生命。邹衡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专治夏商周三代，除《天马一曲村》这一巨大考古报告外，论著百余万言，探讨的基本问题，不是他亲自从田野中掘出来的，就是自己从资料的爬梳中找到的，均具有原创性。邹衡的百余万言的论著，以《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和《试论夏文化》这三论为基干，形成了以论商文化为核心的崭新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体系。邹衡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夏、商、周三代考古学资料急遽积累，信息爆炸，是这时代造就了邹衡，同时也是邹衡创造了这三代考古的新时代，这真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邹衡创立的这崭新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刷新了纪录，超越了前人，在同代人中处于领先地位，邹衡身后的人，不能和邹衡踵接，仍存在相当的距离。后来居上是规律，一定会出现的，而要居上，也得从邹衡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始。我想到这些，向邹衡大声说道：“老邹，我是忠培啊，来看您啦！您这一生，贡献的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这世道对您很不公平，但您作出的贡献，还将发挥作用，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您辛苦啦，累了，好好休息吧！”

送别邹衡后，从病房走出来，我对邹衡夫人说：“我们搞考古的人要感谢你啊，没有你，邹衡不能连续作出新的贡献，没有你，老邹也不可能活到今天。邹衡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接着我又向邹衡的儿子、儿媳和邹衡的学生告别，慰问了他们，便乘电梯下楼，上了车，离开了医院。汽车驶入闹市，我感到天空低了，空间窄了，我孤单了，思绪混乱踟蹰，最后归结到：还是要向邹衡学习。这五年来，凡是涉及邹衡的事与思，“还是要向邹衡学习”总是不由自主地蹦上心头。

2010 年 5 月 3 日下午 5 时初稿于小石桥

201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1 时许改于小石桥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1 年 1 月 14 日第 3 版）

凿空的智慧 难忘的友谊

——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刘士莪*

2005年12月27日，惊悉好友邹衡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噩耗传来，令人震惊痛惜。由于没有条件前去吊唁，思绪万千，只能默默祝他冥冥九泉一路走好。

近来《考古与文物》编辑邀我写篇短文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一周年，极为幸甚！邹衡先生终生忠心耿耿从事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可谓一代师表。他一生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鞠躬尽瘁，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那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勇攀科学高峰的不懈追求，创新立说，誉满中外学术界。他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建树和深远影响，无需我再作称道。现仅就我俩之间的往来友谊略谈一二，以示对邹衡先生的缅怀。

《商周考古》散语

邹衡先生是我结识最早而最知己的一位朋友，我俩难忘的友谊还必须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

1952年，北京大学史学系创建考古专业，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事，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迅猛发展给考古事业带来无限生机，地处历史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也积极步法北京大学筹建考古新专业，并获得教育、文物主管部门的认可。1956年首先成立了考古班，但深感教材、教师缺乏。次年，学校派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学习，目的就是向该校学习创办考古专业的经验。西大领导嘱我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式、师资配备、学生结构直至田野实习，都要虚心拜师，学以为鉴。缘于兄弟院校的协作友谊，我报到后，受到了北大考古专业教师朋友们的热情接纳和大力支持，一切按校方进修计划的要求进行。

教材建设是培养计划的重要环节，更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有力保证。北大考古专业出于对西大筹建专业的真诚援助，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厚望，指定我按计划随堂听课，多接触了解学生，参加教研室教师活动，使我在业务知识、专业建设诸方面获得巨大的收获。

* 刘士莪，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710069。

北大考古专业创办开始，即着手编写了《中国考古学》教材，四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相继编印了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宋辽金元考古、考古技术各段课程的讲义，这为西大考古专业课堂教学提供了重要借鉴。邹衡先生是之前几年认识的朋友，也是北大考古教研室同仁中和我接触最多而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当时他担任商周考古教学，我曾反复请教他关于课程的重点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要求及参考资料等问题时，他虚心赐教，我诚恳求知，从此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治学友谊。

当我问及商周考古教材的编写过程时，他说，“195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后，商周考古的教学是由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来校授课，他编写了一本简要的《殷周考古》讲义，并在1954年加以补充，成为正式的课堂讲授教材。从1956年开始，殷周考古更名为‘商周考古’，由我担任课堂讲授，并根据郭编《殷周考古》和我在兰州大学所编《考古学通论》中的商周部分，加以补充和修改，编成今天你手中所拿的这本《商周考古》教材，油印成册（即1956年油印本），内部使用”。

到1958~1959年，邹衡先生在历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教材精益求精，力求科学完善，在他的主持下，乃组织有关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多人，以1956年的油印本为基础，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编就了新的《商周考古》讲义（1959年油印本），我当时进修在北大，也有幸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参加了这次修改工作。后来得知，1960年曾根据这次的油印本，又广泛征求校外的考古文博界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一次更大的修改，这就是1960年铅印的《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一书。此本印成后，曾寄赠全国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准备继续修改出版。后因“十年动乱”的影响，此愿望变成了泡影。

我们在谈到商周考古断代的问题时，他说，商周考古又称奴隶社会考古。从历史发展史来说，它是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考古中间的一段，包括夏、商、周三代。夏代的考古发现目前知之甚少，商代考古先后有安阳小屯、郑州商城等遗址、墓地以及所出青铜器、陶器和甲骨文的发现，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周代的考古最重要的是陕西长安丰镐遗址的发掘，已给西周考古树立了一个年代和分期的标准。还有濬县辛村、洛阳东周城、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都是很重要的发现。至于周代考古下限，我主张采用郭沫若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意见，将郭宝钧先生《殷周考古》中的战国部分删去而截止于春秋末期。

他还说，商周考古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宋代以来，不少金石学家在这方面也试图作过研究，特别是对新出的商周青铜器之收集著录，取得了丰硕成果，功不可没。近世以来，我国古代青铜器被列强掠夺走的难计其数，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劫夺行为是卑鄙犯罪的，是历史的耻辱，但商周青铜器作为世界人类文明的遗产来说，面对他们进行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有益者商周考古也可吸纳为我所用。要写一本形式科学、内容丰富、立论有据、并能充分反映我国奴隶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考古教材，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